

段著《东原年谱》补正

杨应芹

雍正元年癸卯，先生生。讳震，字东原，以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。^①

按：又字慎修。早年室名“游艺塾”。《考工记图》书末落款：“时柔兆摄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间，东原氏书于游艺塾。”中年后题室名为“爱日楼”。北大图书馆所藏《水经》一卷抄本，卷首有“爱日楼定本”五字，上海图书馆所藏《声韵考》稿本，封面书“爱日楼声韵考”。胡适说：“扬子《法言·孝至篇》：‘不可得而久者，事亲之谓也，孝子爱日。’东原之父尚在，已年高，故楼名爱日。”^②

其生日，公历为1724年1月19日。以下《年谱》各年岁数，依公历当分别减一岁。

乾隆七年壬戌，二十岁。是年自邵武归，同邑程中允恂一见大爱重之。婺源江慎修先生永，先生一见倾心，取平日所学就正焉。

按：该条文字出自洪榜《戴先生行状》。审视《行状》，则可发现段氏因引文删削太甚而致生大错。戴震见程恂是在为“自邵武归”，而他始见江永则远在“自江宁归”之后。因戴震自邵武归后，又随父往江宁拜谒同族长者戴瀚，并馆于其家。“自邵武归”与“自江宁归”相去数年。“自江宁归”后先从学于方朴山，后请业于江先生。《行状》于此记述甚明。关于戴震始见江永的确切时间，程瑶田《河西寓公叙略》载，方槩如次子方粹然“岁己巳（乾隆十四年，1749）

为黄山之游，寓居吾徽城外之河西……明年遂与吾弟光莹及二、三学者往受业焉。是年朴山先生应郡守何公之聘，来徽主紫阳讲席。”^③汪梧凤《送刘海峰先生归桐城序》：“忆余生二十五年，从游淳安方朴山先生。后三年，从游星源江慎斋先生。”^④星源即婺源，慎斋为江永别号。据汪中《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序》记，汪梧凤“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十二月卒，年四十七”，^⑤由此可推算出：汪梧凤是出生在雍正四年丙午（1726），“忆余生二十五年”，正是乾隆十五年庚午（1750），与程瑶田所记方朴山来徽主紫阳讲席时间吻合。“后三年”即乾隆十八年癸酉（1753），江永讲论经义于书院怀古堂，“先生（指戴震）一见倾心，因取平日所学就质正焉”^⑥。《年谱》误将戴震见江永的时间提前了十又一年。^⑦

十年乙丑，二十三岁。先生有《答江先生论小学书》。按：先生此书作于何年，未可详，而《六书论》成于乙丑，则此书当附见于乙丑。

按：《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》的内容，基本上见诸《经考》卷五《尔雅》。而《论小学书》的内容则更为缜密具体，此书显然是在《经考》卷五《尔雅》内容的基础上写成的。《经考》卷四《大戴记八十五篇》后署“乾隆丁丑夏东原氏记”，可见《经考》一书成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（1757）夏或稍后，而《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》亦无疑作于丁丑之后。

十一年丙寅，二十四岁。是年《考工记图注》成。

按：“考工记图注”，误增一“注”字，当作《考工记图》。其注作于乾隆二十年乙亥（1755）。纪昀《考工记图序》：“戴君东原始为《考工记》作图也，图后附以己说而无注。乾隆丁亥夏，余初识戴君，奇其书，欲付之梓。迟之半载，

戴君乃为余删取先、后郑注，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。”^⑧
十三年戊辰，二十六岁。齐学士次凤先生，一见（《考工记图》）
而叹曰：“诚奇书也。”

按：戴震在世时，乾隆某年所上江西大钟，正与《考工记图》合。1980年，秦俑考古发掘的大型铜马车构件，与《考工记图》“当兔在舆下正中”不谋而合。

十四年己巳，二十七岁。先生有《尔雅文字考》十卷。

按：《尔雅文字考》已散佚。《经雅》为戴震早年之作^⑨，此二书的关系待考。

是年程瑶田与戴震一见定交（详见下）。

十五年庚午，二十八岁。

按：是年受教于方黎如。《行状》曰：“先生自江宁归时，淳安方黎如先生掌教紫阳书院，一见先生文，深折服，谓己所不及。继而叹曰：‘今之徐子卿也。’同学者请曰：‘若某某句，其可通邪？’方先生指而示之曰：‘是出某经某史，顾若未读耳。’因言其命意之精，同学者骇叹，由是稍稍知先生之能文。”后来戴震作文颇得方氏之道。段玉裁说：

“师尝闻作文之诀于方氏文辔曰：‘善做不如善改，善改不如善删。’故师作文不厌改删。”^⑩

是年与汪肇澐（字稚川）等定交。程瑶田《五友记》：

“庚午、辛未之间，余与稚川及余姊婿汪松岑三人同研席，每论当世士可交而资讲习益者，余曰：‘戴东原也。’东原名震，休宁隆阜人。先是己巳岁，余初识东原。当是时，东原方踰于小试，而学已粗成，出其所校《太傅礼》示余。

《太傅礼》者，人多不治，故经传错互，字句讹脱，学者恒苦其难读，东原一一更正之。余读而惊焉，遂与东原定交。至是，稚川、松岑亦交于东原矣。”^⑪

《五友记》又记东原语曰：“《水经》酈道元注亦如

《太傅礼》，人所不治者，其经、注之错互，字句之讹脱，与《太傅礼》无异。扬雄《方言》，所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，治古文者资之，与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同功。而文章之古，益以转写之讹，人望之如蚕丛未辟者然。是皆不可不治其芜杂，使就条理。”^⑫由此可见，戴震研究《水经注》、《太傅礼》诸书，早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了。

十六年辛未，二十九岁。

按：是年暮春手抄《春酒堂诗集》。原抄本两册，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1925年2卷1期影印有该抄本的首页及末页。末页后署有“辛未春休宁戴震抄本”，其下加盖“臣”、“震”二图章。《春酒堂诗集》的作者周容，浙江鄞县人，明末诸生，明亡后为僧，既而侍母返俗，踪迹遍天下，所交皆遗民。有人以博学鸿词荐，竟以死拒之。戴震手抄其诗，心迹可见。

《孟子私淑录》三卷，亦作于是年或稍前。缪荃孙《艺风藏书记》卷一：“《孟子私淑录》三卷，休宁戴震撰，问答体，曲阜孔氏散出书。卷面题字‘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春三月录’三行。”^⑬

十七年壬申，三十岁。

按：为程瑶田作篆书对联：“论古姑舒秦以下，游心独在物之初。”后署“海阳戴震”，为程瑶田手迹，下加瑶田“葺荷散人”印章。瑶田别号“葺荷”，世居歙县荷花池，故取《湘夫人》“葺之兮荷盖”句意以为号。署名印章之下，程瑶田识语：“乾隆壬申岁，戴东原为瑶田作此联，自以为不能作楷书，遂令瑶田为书款也。自是之后，即篆书亦绝不肯为。越二十有六年岁在丁酉，东原卒于京师。又后九年，偶见故人手迹，悲感交并，因援笔记之。乙巳正月二十一日，易田（印）。”此联影印件见北大《国学季刊》1925年2卷1期。

是年夏，始馆于汪梧凤家。程瑶田《五友记》：“壬申夏，松岑言于其从祖之弟在湘，在湘因延东原至其家，以教其子。”在湘为汪梧凤字。

十八年癸酉，三十一岁。是年《诗补传》成，有序，在癸酉仲夏。

按：是年江永讲论经义于紫阳书院怀古堂，戴震等从之学。

《毛诗补传》二十六卷，被传抄出去后题名曰“戴氏经考”。原抄件今藏北京图书馆，有“汪灼校书藏画之印”、“叶氏德辉鉴藏”、“南宫邢氏珍藏善本”等印章，由此可见该抄本在民间流传的始末^④。

十九年甲戌，三十二岁。

按：是年入都。王昶《戴东原先生墓志铭》：“余之获交东原，盖在乾隆甲戌之春，维时秦文恭公蕙田方纂《五礼通考》，延致于味经轩，偕余同辑‘时享’一类，凡五阅月而别。”钱大昕自编《竹汀居士年谱》十九年甲戌条：“是岁移寓横街……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《五礼通考》。休宁戴东原初入都，造居士寓，谈竟日，叹其学精博。明日言于文恭公，公即欣然与居士同车出，亲访之，因为延誉，自是知名海内。”^⑤

约在是年前后，作《水地记初稿》。孔继涵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六月亲笔题序曰：“乾隆丁酉夏四月，饮于同年程吏部鱼门米市胡同寓，假是二书归抄之。《水地记》乃戴东原先生二十余年前流传之稿底也，鱼门兄题云未定本。癸巳之夏，东原寓于洪刑曹素人兄处，见其所著《水地记》未曾编次，置一大簏中，手检以相示，及抄得是本。与东原语及，东原曰：‘是草稿者，不足存也。’”初稿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引用《水经注》的原文。其引文已改正了殿本校出错误的一半以上，是戴震早年研究《水经注》的重要见证。

《水地记》原抄本五册，其中初稿五卷，定稿一卷，今藏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。孔序及精抄本有初稿二卷、定稿一卷，今藏北京图书馆。

二十年乙亥，三十三岁。盖是年入都。纪文达公《考工记图序》曰：“乾隆乙亥夏，余初识戴君。”

按：由王昶《墓志铭》和钱大昕自编《年谱》来看，戴震入都后首先拜会钱大昕，由钱大昕推荐而为秦蕙田所延请，因在秦氏味经轩同纂《五礼通考》而结识王昶。后来纪昀、王鸣盛、朱筠等先后与戴震结交。段玉裁对于戴氏同诸公定交的先后顺次失考，徒据纪昀《考工记图序》“乾隆乙亥夏，余初识戴君”，以及《与王内翰凤喈书》写于乙亥（见经韵楼本《文集》卷三），而误定入都在乾隆二十年乙亥（1755）。

《周礼太史正岁年解》二篇、《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》二篇，皆节录自《经考》卷四。前二篇为《大戴礼记八十五篇》的按语，其文落款“乾隆丁丑夏东原氏记”。后二篇为《月令》的按语，文末无年月。此四篇均应系二十二年丁丑条下。微波榭本《文集》于《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一》题下妄加“乙亥夏”三字，玉裁亦未审视，故因袭其误。

族子侵占戴震祖上坟地出卖给程氏，卢文弨曾为之调解。详见《抱经堂文集》卷八《与程致堂以道进士书》。

二十二年丁丑，三十五岁。似先生是年冬日出都，在扬州……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，当亦其时所作。仲明名镜，是姓，江阴人，客游于扬者，欲索先生《诗补传》观之，先生答此书。仲明筑室于江阴舜过山讲学，其人不为先生所重，故讽之。

按：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八章，据《是仲明年谱》所记，已指出段说之误。一、是仲明世居阳湖，非江阴人。二、是仲明与顾昉滋等同讲学于无锡共学山居，而未曾筑室于舜过山讲学。三、乾隆二十二年是仲明已六十五岁，

无客游扬州事。四、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非丁丑所作。《是谱》载，乾隆十四年己巳五十七岁，仲明春游徽州，次年庚午五月再之徽州，游黄山。钱氏推测，“己巳、庚午两年，是戴相晤于徽州”。此推测是可信的。戴震庚午（或稍前）随父由江宁归，与是仲明相见当在此年。《论学书》“昨遇名贤枉驾，望德盛之容，令人整肃，不待加以诲语也”云云，可断此书即作于同是仲明相晤后之数日。该书题下经韵楼本有“癸酉”二字，为微波榭所无，显然为段编《文集》时据《诗补传序》作于“癸酉仲夏”而误增，故不可为据。^⑩

二十四年己卯，三十七岁。

按：是年孟冬，为桐城叶酉（字书山）《春秋究遗》一书作序，见《文集》卷十《春秋究遗序》文末署。

二十五年庚辰，三十八岁。是年客扬州。幼植名大椿，丙戌进士。

按：是年与沈大成同校何焯校本《水经注》。杨希闵过录沈大成校《水经注》，有沈大成记曰：“庚辰初夏，从吾友吴中朱文旂免借何义门校本，复校于广陵。同观者休宁戴东原震，亦耆古之士也。”^⑪该《水经注》校本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，笔者有幸饱览，戴震亲笔批校九十七条，基本为殿本《水经注》所采用。

任大椿当为乾隆三十四年己丑（1769）进士（见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），段氏作“丙戌”，误。

二十八年癸未，四十一岁。是年春，先生入都会试不第。为王君涵斋作《诗比义述序》。涵斋，癸未进士王栗人宽之父也。是年往江右，有《凤仪书院碑》。

按：为王千仞（字涵斋）作《诗比义述序》，在乾隆四十一年丙申（1776）。乾隆五十七年嘉德堂刊《诗经比义述》，其序有三，戴序居首，落款“乾隆丙申三月休宁戴震谨序”。

《文集》中的《诗比义述序》，将其落款时间刊落^⑧。

王宽当为乾隆三十一年丙戌进士（见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），作“癸未”，误。

钱大昕《戴先生震传》：“乾隆壬午中江南乡试，明年试礼部不第，薄游汾、晋间。”不知钱氏所记确否。又魏建功认为，《凤仪书院碑》乃“在南丰、邵武间游后居徽时所作”^⑨。此表明魏氏对于“是年往江右”也持怀疑态度。

二十九年甲申，四十二岁。

按：此条原谱缺漏，笔者增补。

三十年乙酉，四十三岁。是年秋八月，定《水经》一卷。

按：《水经》一卷由水经、附考、后记三部分组成，另外又附有作者“以河江为纲，按地望先后”而考定的《水经》一百二十三条水的新次序，故又题名曰《水经考次》。《水经》一卷抄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，《水经考次》藏北京图书馆。从混淆的经、注中辨析出全部经文，是这一卷书的中心内容。“附考”乃力图补正《渭水篇》的漏简和《颍水诸篇》的错简。“后记”交代了辨析经、注的办法和标准，即四大义例。作为独立成篇的文章，“后记”当题名为《书水经后》。而段玉裁收此篇入《文集》时误增一字，曰“书水经注后”，从而置于晚其近十年的《水经酈道元注序》之后，又删去了“其语已见于前篇”的二百多字，其中正好包括四大义例。

三十一年丙戌，四十四岁。是年玉裁入都会试，见先生云“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”，谓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也。注《诗》周南、召南，名之曰《杲溪诗经补注》，“杲溪”二字，盖以自别于诸言《诗》者。先生不随俗为别号，天下称东原先生而已。

按：“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”，梁启超说：“正是《绪言》耳。”^⑩钱穆则认为：“东原所告茂堂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

者，实即《原善》三篇之扩大本，茂堂不察，未经面质，后遂误认为所告乃指《字义疏证》也。”^{②①}梁、钱所云，不知孰是，姑录之待考。

《戴东原先生文·乐山记》中有“杲溪”、“杲山”，为歙县的小溪、小山名。又《屏山石室记》中有“杲溪先生”，后朱笔改“杲溪”为“友堂”，眉批曰：“杲溪字友堂”。以上两篇文章分别代吴入云、吴希声。检《戴东原先生文》和《戴氏杂录》（皆北大图书馆藏），共收文三十八篇（包括重文），其代改者六篇，代作者十四篇。戴震一生有志于闻道，勤奋写作，并不以此求名利，但偶尔也用以作为谋生的手段。疑《杲溪诗经补注》亦为一时捉刀谋食之作，故有此名而未得完篇。

是年在都，章学诚登门请学。其《答邵二云书》云：“丙戌春夏之交，仆因郑诚斋（虎文）太史之言，往见戴氏休宁馆舍，询其所学，戴为粗言崖略。”^{②②}同年，章学诚《与族孙汝楠论学书》：

往仆以读书当得太意，又年少气锐，专务涉猎，四部九流，泛览不见涯涘，好立议论，高而不切，攻排训诂，驰骛空虚，盖未尝不惘然自喜，以为得之。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：“今之学者，毋论学问文章，先坐不曾识字。”仆骇其说，就而问之，则曰：“予弗能究先天后天，河洛精蕴，即不敢读‘元亨利贞’。弗知星躔岁差，天象地表，即不敢读‘钦若敬授’。弗能辨声音律吕，古今韵法，即不敢读‘关关雎鸠’。弗能考三统正朔，《周官》典礼，即不敢读‘春王正月’。”仆重愧其言。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“学者只患读书太易，作文太工，义理太贯”之说，指虽有异，理实无殊。充类至尽，我辈于四书一经，正乃未尝开卷，可为惭惕，可为寒心！^{②③}

由此信我们可以看出，第一次见面，戴震在章学诚心目中所留下的真实印象，以及戴震治学方法对章学诚早年的影响。

三十二年丁亥，四十五岁。客冬至京师，盖客江右而又入都。

按：该条所记有误。二十八年癸未条曰“是年往江右”，三十年乙酉条曰“是年入都过苏”，三十一年丙戌条曰“入都会试不第”。按惯例，会试在春季；而丙戌不第后又未曾出都，何乃“客冬（即丙戌）至京师”？因此据《年谱》所记，“客冬”当为“前冬”（即乙酉）之误。

三十三年戊子，四十六岁。是年修《直隶河渠书》一百十一卷。次东西淀合唐河、沙河、滋河、府河、易水、涑水、清河共三十一卷。

按：段玉裁《与方葆岩制府书》、《直隶河渠书辨》均统计为一百零二卷。这是嘉庆十五年（1810）戴中孚将书稿送到苏州，玉裁“披读往复”，具体记下这个数字的。《年谱》将一百零二卷改为“一百十一卷”，未作任何说明，显然有误。而细统计其所列卷数，也不是一百十一卷，而是九十六卷。将《年谱》所记同《与方书》对勘发现：一、《年谱》遗漏“永定河十六卷”。二、《与方书》“东西淀二十一卷”，其下有小字注文详列各水卷数，即：“内唐河三卷，沙河一卷，滋河一卷，府河五卷，易水五卷，涑水一卷，清河五卷。”诸水相加，与“二十一卷”合。《年谱》则笼而统之说“共三十一卷”，其“三”字无疑为“二”之误。以上两项差错，便使《年谱》比《与方书》少了六卷，而为九十六卷。估计《年谱》中“永定河十六卷”系漏刻，玉裁并未漏写；东西淀等“三十一卷”是玉裁笔误，而统计时又未发现，这样便多出十卷；又“涑河合热河一卷”，因“仅有纲目而条目未详”，在统计时便没有算在内，则正好多出九卷，如此便使原来统计的“一百零二卷”讹为“一百十一

卷”。

又胡适1948年9月在南京借得中央图书馆所藏《直隶河渠书》稿本二十六册，“核实计算，除去复本，除去末册，二十三册共存九十二卷”^②。此当为实有卷数。

《東鹿王封村广福禅林记》似作于是年。此为至今发现的唯一一篇戴震记述释氏的文章，全文如下：

保阳之南，東鹿之北，有广福禅林。住持云峰。云峰得法罔然，罔然接派皎月。皎月者，曹洞三十二代嫡宗也，俗籍中州，九峰山披剃，万松受戒，白云付法。潜心参学，遍觅本宗，冀获大业。性贞敏善悟，静参动契，本源了(然)^③，正觉融融。年三十即坐霸州之观音寺方丈，所见不赞不漏，綦显綦平，接引指陈，入手有据，以故开堂放戒，僧众云集。東邑广福禅林，偏县穷乡，足迹罕到，创建后地渐兴隆。土人思所以光大而久远之，非正教真僧，接众十方，始获永远。士庶乃爇香肩輿，迎皎月而主法席焉。驻锡后闭关面壁，见性明心。家法以道德相传，不立眷属，计防争越。历春秋凡四十余而圆寂，付法罔然。罔然克衍宗旨，递传云峰。二十年来，增扩培植，殿堂佛像整齐庄严，复构全藏经文秘笈保护。金云云峰之心力俱瘁，不知云峰之得力殊不在此。闻其参学天童时，悟道甚捷，入定得觉，劈脊一掌，提撕此身，幻然而无，复飘然而有。由是而本源洞澈，大义了然，因以“一掌”自署，所持颇得洞宗。待人接众，一以真诚，了了数言，足豁人心。年来受教者益众，云峰愈自检持。顾本同源，初无一二，道缘深浅，早暮殊途，诚恐拘学鄙见，不免真谛，妄事诋訾，是用弁数语，并昭劝勉焉。戴震（印）东原（印）。

由此文可以看出，戴震虽竭力批评后儒以佛乱经，但是他对佛教并不排斥。由“顾本同源，初无一二，道缘深浅，早暮

殊途”云，可以看出戴震对佛学也曾有研究，他认为佛教不同派别的相互影响乃至融合是必然现象，这种见解颇非一般，大概戴震正因为是局外人，以旁观者的眼光，所以才会有如此高见。戴震反对以佛乱经，而他的文章却也似有几分以儒说禅的味道，如“家法以道德相传”，“待人接众，一以真诚”。此遗墨今宝藏于首都博物馆。

又，是年《声韵考》成。上海图书馆藏《声韵考》稿本，副页有戴震识语二则，一则曰：“戊子年拟用小板付梓，后因论古韵未详备，遂止。其古韵一条，壬辰年始改定。”

三十四年己丑，四十七岁。

按：段玉裁《答程易田丈书》：“己丑五月往山西方伯朱文正署中，客山西者几三年。己丑秋后，自藩署至汾州修府志，庚寅乃竣。辛卯又修《汾阳县志》。”

是年六、七月，作《开成石经补缺正非》、《石经孟子讹字录》。另有《穀梁石经改字》、《唐石经葛本春秋左氏传校谬》，未署明时间，而墨迹、用纸相同，似与前二种作于同一时期。四种合订为一册，题名《石经补字正非》，手稿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三十五年庚寅，四十八岁。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《记洞过水》一篇。龚君方修《寿阳志》，请先生点竄，先生因为辨正晋、隋、唐史“寿”、“受”二字之讹乱，并为审定目录，今手稿犹在玉裁处，皆端楷也。有代某作《应州续志序》等。

按：《记洞过水》亦收入《经韵楼集》卷七之中。今检其底稿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），原文作者当为段玉裁，而详加评改的文字却是戴震的手笔。其评语一方面说明增改的原因，一方面又极高地赞扬此文的寓意布局。戴氏对玉裁的赏识厚爱，由此可见。玉裁大概出于对先生的感激之情，在重编

《东原文集》时便将此文收入卷六，并于《年谱》中加以说明。后人不知个中情由，而文章又是玉裁的手稿，于是又收入他的文集中^②。经韵楼本《文集》中的《记洞过水》题下有“己丑代”，原稿无。《应州续志序》题下亦有“己丑代”，而微波榭本只有“代”字，无“己丑”二字。则此二篇到底是作于己丑、还是作于庚寅，难以确定。

是年尚有《汾州府志序》（代朱珪）、《宁乡县志序》（代朱茂炳）、《永宁州志序》（代王兴穀）、《正汾州府名宦祠秩祀碑》（代孙和相），均见于《戴东原先生文》和《戴氏杂录》，皆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“辨正晋、隋、唐史‘寿’‘受’二字讹乱”，见于手稿《寿阳县志序》，墨迹灿然，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三十六年辛卯，四十九岁。《温方如西河文汇序》云：“己丑秋，再至山西……”

按：序云“己丑秋，再至山西”，原可证明钱大昕《东原传》壬午明年“薄游汾、晋间”的话，然而查微波榭本《文集》及稿本，《温方如西河文汇序》中均无“再至山西”四字，此为衍文无疑，钱氏的话仍要打问号。

三十七年壬辰，五十岁。《水经注》自刻本与聚珍板同时而出。会试南归，与胡亦常同舟月馀。

按：自刻本与聚珍本均无刊行的年月。四十一年丙申（1776）十一月，戴震在京与段玉裁书时，注明“外寄上……《水经注》全部，计十四册”，可见这两个本子均成于丙申或稍前。庞鸿书《读水经注小识序》云，自刻本“乃东原真本”，“武英殿本虽亦题戴氏名，然已经馆中诸人改易，其校语亦非尽出于东原手也”。庞氏所云，颇值得后人注意。又自刻本的板归孔继涵，孔氏据以重印。然后世径称之孔刻本或“遗书”本，实乃大误。

是年在都，曾馆于朱珪家（见段玉裁《答程易田丈书》）。

南归与胡亦常同舟事，钱大昕《孝廉胡君墓志铭》曰：“同谦（胡亦常字）以《诗经》举于乡，出吾友益都李南垌之门……既下第南归，与休宁戴东原同舟，至富春江乃别，舟中尽抄东原所著书携归，将刊之东粤。”^{②7}

三十八年癸巳，五十一岁。

按：是年夏，与章学诚相遇于宁波道官署，对于方志的内容、编修的体例，二人分歧甚大，不欢而散。章学诚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》说：“见余《和州志例》，乃曰：‘此于体例则甚古雅，然修志不贵古雅。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，绝不异人，亦无一定义例，惟所便尔。夫志以考地理，但悉心于地理沿革，则志事已竟。侈言文献，岂所谓急务哉？’”又云：

“明日示余《汾州府志》，曰：‘余于沿革之外，非无别裁卓见者也。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，余欲删之，而所载实事，卓卓如彼，又不可去。然僧岂可以为人？他志编次人物之中，无识甚矣。余思名僧必居古寺，古寺当归古迹，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，庸史不解此创例也。’”^{②8}这里戴震说“僧岂可以为人”，意谓僧侣非常人，不宜列入人物门。学诚反诘：“如云僧不可以为人，则彼血肉之躯，非木非石，毕竟是何物邪？”似为有意曲解作难。

戴震入都后，十月三十日与段玉裁书曰：“仆今暂寓纪公处，出月初五移洪素人兄处。”这时候，他手头颇为拮据，其书又说：“仆此行不可谓非幸邀，然两年中无分文以给旦夕。曩得自由尚内顾不暇，今益以在都费用，不知何以堪之。”汪灼《与戴东原先生书》曰：“去年岁暮宴坐，即念长安米贵，思所以为一夕之卫者而未得其便。兹值世兄奉太夫子就养都门，谨措百金，为凑道里之费。灼忝附门墙，

于先生事自当惟力是视，所恨食指多，家计落，不克称此心耳，尚何敢当言借耶！”^②由此信可以看出，戴震在都的生计，已部分靠借贷维持。

三十九年甲午，五十二岁。是年十月三十日与玉裁书蜀中。

按：“是年”当为“去年”，即癸巳。三十九年甲午，戴震未曾有书与玉裁。

是年在四库馆校订大典本《水经注》，洪榜《行状》曰：“先生究心于是者八九年，寻其义例，按以准望，整之还其旧，俾诸水经支，川渠委纳，厘然就条贯，而是书遂为考舆地家适用之书。先生治是书将卒业，会朝廷开四库全书馆，奉召与为纂修。先生于《永乐大典》散篇内因得见酈氏自序，又获增益数事。馆臣即以是属校正，上其书，诏允刊行焉。”孔继涵《戴氏自刻本水经注序》：“东原氏之治《水经注》……刊于浙东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京师，与修《四库全书》。又得《永乐大典》内之本，兼有酈道元自序，乃仍其四十卷，而以平日所得详加订正。”^③朱筠《戴氏校订水经注书后》：“东原初征入四库馆，以其生平所校《水经注》本，更据《永乐大典》所引互校，损益至二、三千言之多，而酈氏原序亦出焉，乃并录以成书，官刻编之聚珍板中者也。”^④戴震在四库馆校订《水经注》，洪榜诸人皆在都中，且一向与戴震交往甚密，以上记述，当为目击实录。正因为戴震以其平生所得去校订大典本《水经注》，所以能在数月内神速完成。另外，校订由大典中录出的《大戴礼记》、《方言》等，也是如此。

四十一年丙申，五十四岁。

按：是年秋，毕沅赴任陕西巡抚前，登门拜访戴震，戴震为之作《送巡抚毕公归西安序》，详说官场“知人之难”，特别告戒他：“有知人之责，而工诈欺之人至矣，潜妒诬之人

至矣。又况情好或偏，彼探窺得之人焉。”并希望他体恤民艰，“有一念及其民，则民受一念之福”。

是年春作《诗比义述序》、《答段若膺论韵》，秋作《昆山诸君墓志铭》，《夏侯阳算经》、《五曹算经》校成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与段玉裁书曰：“仆自三月初获足疾，至今不能行动，以纂修事未毕，仍在寓办理。拟明春告成，乞假南旋。”又曰：“仆于本月十六移寓北官园范宅，在海岱门之西，前门之东，更远人迹。”

四十二年丁酉，五十五岁。

按：戴震在逝世前的半年中，先后给段玉裁写了四封信，每一封信都说到要“南旋”的打算，而且一封比一封态度坚决。甲申一月二十二日书曰：“拟明春告成（指纂修事），乞假南旋。”丁酉正月十四日书：“今夏纂修事似可毕，定于七、八月间乞假南旋。”四月二十四日书：“定于秋乞假南旋，实不复出也。”五月二十一日，即临终前六天的书曰：“归山之志早定，八月淮南旋。”贫病交加，世态炎凉，戴震在都中的处境心境，均由此可知。

焦循《申戴》：“王惕甫未定稿载上元戴衍善述戴东原临终之言曰：‘生平读书绝不复记，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。’”②

戴震在四库馆共校书十六种，除《张丘建算经》、《蒙斋中庸讲义》两种外，其余皆曾由武英殿聚珍版排印。武英殿本既署总纂官纪昀、陆锡熊的名字，也署纂修官戴震的名字。戴震逝世后的排印本则于“纂修官”前加一个“原”字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一概删去戴震名，另加署总纂官孙士毅和总校官陆费墀。

《戴东原先生文》中，有两页关于《仪礼注疏》考正的

手稿，估计为佚著《仪礼考正》的残卷。

是年四月，戴震亲手将《水地记》定稿第一卷交付孔继涵（见北图抄本《水地记》孔序）。此即《戴氏遗书》中的《水地记》一卷。

痛斥“后儒以理杀人”的《与某书》，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的写作时间似不相前后。该书手稿收在《戴东原先生文》中，为狂草疾书。于“死矣更无可救矣”之下，原稿有“人各巧言理，视民如异类焉，闻其呼号之惨而情不相通”二十二字被删去。由字迹、语气可以看出，戴震作此书时愤慨之至。

《年谱》谓：“洪舍人《行状》则曰‘未成书，《水地记》七册’。”此处“洪舍人《行状》”，当为“王昶《墓志铭》”。洪榜《行状》曰：“《水地记》三十卷。”王、洪二氏所记皆是。《水地记》七册，乃王昶所见到的抄本册数。三十卷，可能为戴震写作的计划。南通图书馆现藏抄本五册，记有河水、济水、淮水，但没有江水。其中有两本封面标有册次，另三本未标。标册次的是“水地记初稿二”，其内容记河水；又“水地记初稿五”，其内容记济水。孔继涵题序曰：“检其遗稿，则皆整比为长编，而未及作中第四、第六二册”，此四、六两册当是记江水的初稿及有关内容。定本《水地记》一卷，只记了黄河流程的一半，即自河出昆仑之墟至太行八陁而止。同时《水地记》不仅记水，还要记山、记郡，原抄本已有了记山、记郡的初稿便是明证。因此，《水地记》计划要写成三十卷是没有疑问的。

《年谱》曰“孔户部刻《戴氏遗书》凡十五种”。然统计其下小注所列的书目却只有十四种。实际上，孔继涵于戴震逝世后刊《戴氏遗书》为十二种，小字注所列“曰《句股割圆记》三卷，曰《策算》一卷”，此二种刻在戴氏生前，

收于《算经十书》之中。《算经十书》中还有戴震的《九章算术补图》一卷、《五经算术考证》一卷。因此孔刻戴书总共为十六种。

孔刻《戴氏遗书》所收的十二种书皆编有次第，其末“《文集》为遗书之二十三”。段玉裁说：“未识次第之意。”今检孔广森《戴氏遗书总序》，其中包括《水经注》，共列戴著正好二十三种。估计孔氏原来是有全部刊刻打算的，无奈家境衰落，继涵又早逝，致使原计划未完全实现。

《总序》二十三种之中还有《直隶河渠书》。据胡适考证，《直隶河渠书》的作者应是桐城方观承，戴震只是此书的修订者之一。详见《记中央图书馆的河渠书二十六册》。^③

关于“《经义》十八首”，任兆麟《戴东原制义叙》曰：“岁丙申，余甄综近世名人制义为一集，兄领从自京师邮寄数家，休宁戴君东原文稿在焉。君于学靡所不通，为世儒宗，制义抑其末也。顾识趣体格，并臻极至，言性诸篇，与所著《原善》相表里……东原数艺俾长留天壤间，诟不幸与！它日有传其别集者宜采焉。”^④是书今不知存佚。

在孔氏《微波榭丛书》之后，戴震著作依次刊刻的有：《绪言》三卷，清无名氏刊，与《原善》合为一册，今北京图书馆有藏。《尚书义考》，光绪中贵池刘世珩刊，收入《聚学轩丛书》第三集。《经考》五卷，南陵徐乃昌刊，收入《邗斋丛书》。《中庸补注》一卷，刊于《国粹学报》1910年1号63期。《续方言手稿》不分卷，刘半农1928年得之于北京厂肆，1932年中央研究院影印。《经考附录稿本》七卷，1936年安徽丛书编印处影印，收入《戴东原先生全集》。《屈赋注初稿》三卷，同上。《与段茂堂等十一札遗墨》一卷，同上。《孟子私淑录》三卷，刊于四川省图书馆《图书集刊》1942年创刊号。以上已刊著作共二十六种。

于1995年底出版的《戴震全书》，增收未刊稿如下：

《毛诗补传》二十六卷，原北京图书馆藏。《深衣解》一卷，同上。《石经补字正非》四卷，原北大图书馆藏。《经雅》七卷，原湖北省图书馆藏。《水地记初稿》五卷，原南通市图书馆藏。《水经考次》一卷，原北京图书馆藏。《算学初稿四种》，原北大图书馆藏。《戴东原先生文》、《戴氏杂录》各一卷，同上。

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作于嘉庆甲戌（1814）或前一年^⑤。该谱以治学为中心，记述戴震一生的著述与交游，内容丰赡，材料翔实，是后世研究戴震及其同时代有关学者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。《年谱》的作者段玉裁，于乾隆癸未（1763）拜识戴震于都中，从此师友相交十几年，对戴震最了解。始为戴震作谱者，若非段玉裁，后世谁也不可能写到如此详尽的地步。玉裁作谱之功，当千秋不灭！

《年谱》之作成，戴震已故三十七、八年，玉裁亦为八十老翁。由于时间久隔，作者年迈，漏记误记，在所难免。且谱成之次年，玉裁也与世长辞了，故未得严加修订。后世为戴震作传记的不少，但对段著《年谱》信守不二者居多，所作文章的内容基本上超不出《年谱》，而《年谱》中的错误也多被沿袭。如始见江永，《年谱》系在“七年壬戌二十岁”条下，于是谈到师承关系，其文则少不了有“少从江先生游”云云。然而戴震始见江永，确切无疑不是在“七年壬戌二十岁”时，而是在十八年癸酉（1753），此时戴震已年过而立，还谈何“少”哉。再说，戴震于江永“一见倾心，因取平日所学就质正焉”；而江永“有所疑，十余年未能决”，戴震则“请其书，谛观之，因为剖析比较，言其所以然”，使江永“累岁之疑，一日而释”（以上皆引自《行状》）。由此可见，江、戴的关系当是师友关系，或为忘

年之交的关系。然而令后世遗憾的是，魏默深误据《年谱》，因一“老儒”称呼，而加戴震以“背师盗名”之罪，^⑩王观堂也不作辨正，谴责“其于江氏亦未尝笃在三之谊”^⑪。先贤失辞，后辈痛心。近年与修《戴震全书》，检得部分材料，不揣浅陋，作补正于是，谨俟同仁赐正。

注：

①本文有关《年谱》的引文多系节引，不加引号。《东原年谱》据安徽丛书本《戴东原先生全集》附。

②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《胡适手稿》，第1集1卷80页。

③见《通艺录·修辞馀钞》，安徽丛书本。

④《松溪文集》，汪氏不疏园自刻本，第4页，不分卷。

⑤《述学·别录》，四部备要合订本，第53页。

⑥《戴先生行状》，及下文王昶《戴东原先生墓志铭》、钱大昕《戴先生震传》，均见安徽丛书本《戴东原先生全集》附，不另注。

⑦、⑩、⑪、⑫另详见拙文《段著〈东原年谱〉疑误考》，《安徽史学》94年3期。

⑧见《考工记图》，安徽丛书本。以下戴震著作或所附之序跋，见于安徽丛书本，不另注。

⑨详见胡锦涛《论戴震的佚著〈经雅〉》，《文献》94年3期。

⑩《经韵楼集》卷七《答程易田文书》。

⑪⑫见《通艺录·修辞馀钞》。

⑬《艺风藏书记》，光绪庚子刻本，1卷17页。

⑭详见拙文《关于〈戴氏经考〉即〈毛诗补传〉的考证》，《文献》95年1期。

⑮钱大昕《竹汀居士年谱》，上海书店影印商务1937年本《十驾斋养新录》附。

⑯转引自《胡适手稿》第4集2卷344页。

⑰见魏建功《戴东原年谱》乾隆十五年庚午条，北大《国学季刊》1925年2卷1号第149页。

②⑩《饮冰室合集》，中华影印本第5册，文集之四十《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》，第89页。

②⑪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上册第327页。

②⑫《章学诚遗书》，文物出版社85年版，第645页。

②⑬《章学诚遗书》，第224页。

②⑭《胡适手稿》第1集3卷315页。

②⑮本源了然，“然”字据下文“大义了然”增补。

②⑯《潜研堂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89年版，第818页。

②⑰《章学诚遗书》，第128页。

②⑱《渔村诗文集》，北图藏清抄本，第7页，不分卷。

②⑲见于自刻本《水经注》。

②⑳《笥河文集》，畿辅丛书本，第6卷19页。

②㉑《雕菰集》，丛书集成本，第2册95页。

②㉒《胡适手稿》第1集3卷287页。

②㉓《有竹居集》，嘉庆元年两广节署刻本，第8卷22页。

②㉔参见来新夏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83年版，第99页。

②㉕语见《书赵校水经注后》，胡适手抄，载《胡适手稿》第5集3卷544页。

②㉖语见《观堂集林》，中华影印本，第2册578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大学古籍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